

# 流动人口研究中的概念、数据及议题综述

张展新 杨思思

**【摘要】**流动人口研究在发展中呈现出研究设计的多样性。文章首先辨析流动人口研究中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人口的定义和三者之间关联,对人口普查数据、抽样调查数据和汇总数据在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按照研究对象、数据选择、研究性质和研究成果,对已有文献的不同研究议题进行归类综述。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研究设计多样化产生的问题。

**【关键词】**流动人口 农民工 外来人口 数据类型

**【作者】**张展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思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近30年来,中国的流动人口研究文献数量不断增加,研究内容逐渐扩展。20世纪80年代,以流动人口统计与控制为主;90年代起,全国或地区流动人口的总体研究继续加强,同时出现了以某些流动人口群体为特定对象的专题探索,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农民工的研究。近年来,流动人口研究已形成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并存、研究议题丰富且不断增多的局面。在流动人口研究繁荣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已有文献中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对象、使用数据、研究取向、最终结果等存在明显差别,不同研究处于一定程度的分割状态,缺乏交流与互动。这已经影响到流动人口研究的整体发展。因此需要讨论流动人口研究设计的多样性问题。

本文在辨析流动人口的主要概念和数据类型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研究议题进行归类,分析研究多样化带来的问题。

## 一、流动人口、农民工和外来人口概念辨析

流动人口研究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主要概念的扩展,反映出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在早期的研究中只有“流动人口”这一概念,而最近的研究中“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等概念极为常用。

### (一) 流动人口的定义

“流动人口”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与户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当“流动人口”刚刚进入研究视野时,这一概念一度泛指常住户口人口之外的所有人口,包括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人口、短期逗留人口和“流量”(郑桂珍等,1985;罗茂初等,1986;张庆五,1986)。后来,流动人口的界定逐渐统一为户口登记地与现居住地分离、但长期居住的人

口<sup>①</sup>。这样,流动人口成为一种“中国式”的迁移人口,即改变了居住地、但没有户口登记地相应变更的迁移人口。由于中国流动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并存,而其他国家一般没有这种区别,国际学术界通常采用一些对偶概念来研究中国的迁移流动,如“永久迁移/临时迁移”,“户籍迁移/非户籍迁移”,“正式迁移/非正式迁移”等,后一类迁移即人口流动(Fan, 2001)。

与国际上迁移人口定义和统计类似,流动人口概念总是以特定地理范围为基础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提供了流动人口统计的两个口径及普查结果<sup>②</sup>。第一口径以乡镇街道为边界,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户分离”人口。通俗地说,这是指跨乡镇街道流动的人口。第二口径是在第一口径流动人口中,减去“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这就是说,在市辖区范围内跨乡镇街道流动、改变常住地且无户口登记变更的行为不被视为人口流动。按第一口径统计、普查时点全国31个省份流动人口为261 386 075人,而第二口径统计的流动人口为221 426 652人,为前者的84.7%。2010年的流动人口总量约为2.21亿,这是官方正式报告的当年中国大陆流动人口总量<sup>③</sup>。在下文中,如无特别声明,“流动人口”专指第二口径流动人口。

## (二) 农民工的概念

在流动人口研究中,“农民工”也是一个常用概念,而且近年来被选用的频率明显高于“流动人口”。实际上,学术关注的重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而是“外出农民工”、“流动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农民工是指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户籍劳动者,包括在本乡镇从事非农工作的本地农民工和在本乡镇以外务工经商的外出农民工(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3)。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 223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8 888万,外出农民工15 335万,分别占当年农民工总量的36.7%和63.3%。本地农民工在家乡当地或附近实现了非农转移,并不涉及人口流动。外出农民工的定义符合第一口径流动人口的统计标准,15 335万外出农民工是26 138.6万流动人口(第一口径)的组成部分。图1表示农民工、第一口径流动人口两大集合之间的关系,两个集合的交集就是外出农民工集合。

然而,外出农民工个体不都属于第二口径流动人口,在市辖区内有例外<sup>④</sup>。因此,外出农民工不是第二口径流动人口的子集,“2.21亿流动人口包括15 335万外出农民工”是一个不太严格的说法。图2表示第二口径流动人口、外出农民工两大集合之间的关系。所谓外出农民工,是就流出地而言的;基于流入地视角的概念是“外来农民工”。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概念。“流动人口”的背景是现行户

① 长期居住即所谓“常住”,其时间标准是:1990年“四普”规定为一年以上,而2000年“五普”和2010年“六普”都把这一标准缩短到半年以上。

②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③ “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21亿”,《人民日报》,2011年3月2日。

④ 在一个市辖区,如果一个农村户籍劳动者的非农就业地点在本乡镇之外、本市辖区之内,那么他属于外出农民工,但不属于第二口径流动人口。只有他到该市辖区以外从事非农业活动时,才符合流动人口统计的第二口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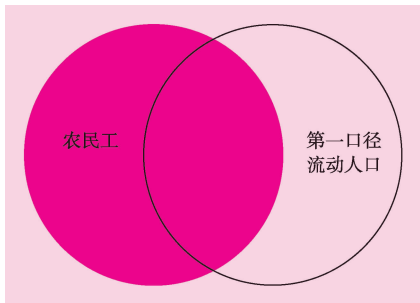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工集合与第一口径流动人口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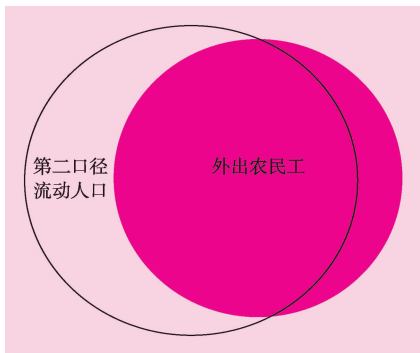


图2 第二口径流动人口集合与外出农民工集合

籍管理制度下的人户分离,而“农民工”源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因此,与前者相比,农民工概念关系到更深层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和身份制社会分层。此外,农民工是从农业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的劳动者,这又涉及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正是由于其制度性、结构性属性,农民工研究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解释性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 外来人口的概念**

在流动人口文献中,有时“外来农民工”与“外来人口”两个称谓混用,但实际上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外来人口”概念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是相对于“本地人口”而言的,通常指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员。在全国性研究文献或政策条文中,一般使用“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这样的总体概念;只是在地域性研究或地方性政策法规中,才有可能选用“外来人口”或“外来劳动力”、“外来务工人员”这类术语。因此,特定区域内进行外来人口数量的统计或估计才有意义。在一个行政区域(通常是省或地级市)内,(第二口径)流动人口由行政区域内部流动人口和区域外流入流动人口两部分组成,后者即这个区域的外来人口。

一些区域性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或研究使用了“流动人口”概念,但不涉及区域内部的流动人口,实际上是以外来人口为对象。按照户口的农业或非农业性质,一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可以划分为农村户籍外来人口(外来农民工及其家属)和城市户籍外来人口(“外来市民”,即城市间流动人口或城一城流动人口)两大类。

“外来人口”概念同样离不开户籍制度,但这种关联不是人户分离,也不是城乡分割,而是户籍身份的区域分割。在城市中,特别是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中,由于地方公共资源紧张、本地居民压力、政绩追求等,政府部门可能利用“本地”、“非本地”两种户籍身份,制定、实施有利于本地人口的地方政策。差异性、排他性的地方公共政策、社会政策派生出新“本地—外来”不平等,这与城乡分割是有区别的。

**(四) 城市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外来农民工的数量关系**

根据逻辑关系和通常的经验观察,在一个城市,流动人口、外来人口与外来农民工(及家属)三者之间存在着以下数量关系:(1)流动人口数量 > 外来人口数量 > 外来农民工及家属数量(逻辑关系);(2)外来农民工及家属数量 > 外来市民数量(经验观察)。

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19 612 368人,其中“人户分离”的第一口径流动人口 10 498 288人,为常住人口的 53.5%。在第一口径流

动人口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2 738 462 人,由此可以计算出第二口径流动人口为 7 759 826 人,为常住人口的 39.57%。在第二口径流动人口中,户口登记地不是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 7 044 533 人,为常住人口的 35.92%<sup>①</sup>。图 3 展示了 20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流动性”结构。虽然第二口径流动人口是测量全国人口流动的核心指标,但对于北京市来说,最重要的是常住外来人口,市域内部的人口流动不是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sup>②</sup>。在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中,外地农业户口人口(农民工及家属)4 768 145 人,为外来人口总数的 67.69%;外地非农业户口人口 2 276 388 人,为总数的 32.31%<sup>③</sup>。

#### (五) 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人口三大概念的使用情况

目前,流动人口、农民工和外来人口是流动人口研究的三大对象,农民工专题研究的文献数量最多。“中国知网”期刊检索结果是:1992~2012 年,以“流动人口”、“农民工”和“外来人口”为核心期刊论文数分别为 2 624 篇、8 456 篇和 1 178 篇<sup>④</sup>。但农民工专题研究论文明显居多的情况是 2000 年以后才出现的。图 4 显示了上述论文数的跨时间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1992~2003 年,“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人口”被选为关键词的论文频数大致在一个水平上;2003 年以后,“农民工”的使用频率上升到最高,“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频率分别是第二、第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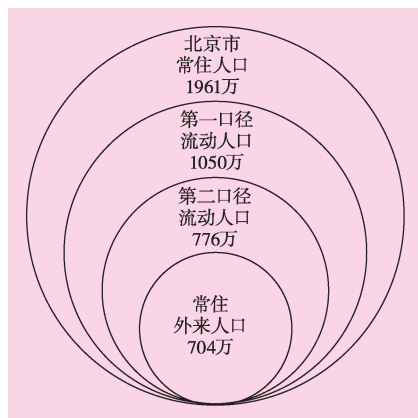


图 3 20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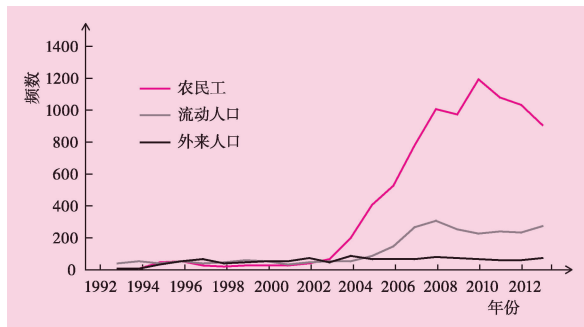


图 4 1992~2012 年核心期刊论文 3 个关键词检索情况

- ① 北京市 2010 年常住人口总数、户口登记地在乡镇街道的人户分离人口数、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数来源于《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第 1 页、第 458 页、第 459 页;常住外来人口数来源于《北京市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外来人口卷》,第 3 页。
- ② 在《北京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只报告了常住人口和其中的外来人口。参见 2011 年 5 月 5 日《北京日报》。
- ③ 外地农业户口人口数和外地非农业户口数来源于《北京市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外来人口卷》,第 7 页。
- ④ 以其他流动人口主体为关键词的论文数目明显要少。例如,运用同样方法检索,以“转移劳动力”和“暂住人口”为核心期刊论文数分别为 204 篇和 220 篇。

由此可见,近10年流动人口研究对象有向“农民工”聚集的倾向。<sup>①</sup>

## 二、流动人口研究的数据类型

流动人口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使用多种数据,包括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专项抽样调查数据和汇总数据。其中使用较多的是1990、2000和2010年普查数据,以2000年五普数据使用的频率最高。除了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也被广泛使用。该调查数据覆盖全国、样本量极大,有类似于人口普查数据的收集人口统计信息功能,被视为小普查。在流动人口研究的原创性文献中,普查数据和1%抽样调查数据的主要用途是:(1)作为主数据使用,提供研究发现;(2)作为配套数据或辅助数据使用,此时其他数据可以是抽样调查数据,也可以是汇总数据;(3)提供一些关键性指标,用以评估主数据的样本代表性。

抽样调查是按照某种目的或需要设计的,抽样调查数据可以用于描述性研究,也可以用于解释性研究。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抽样调查数据的主要用途是后者,为理论导向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学者所偏爱。流动人口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根据抽样地点划分为流出地调查数据和流入地调查数据。流出地抽样调查,即在流动人口的家乡来组织调查、获取数据。流出地调查一般在农村展开,调查对象主要是外出农民工。目前最重要的流出地调查是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调查范围为全国899个县、7500多个村(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3)。该调查数据是全国农民工基础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于农民工研究而言,有类似于普查数据或1%抽样调查数据的作用。另外,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也在农民工流出地组织了抽样调查,获得了全国性数据。但只有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各项估计指标较为接近(张展新等,2011)。在流动人口研究中,上述全国性流出地调查数据几乎不曾作为主数据使用;需要获得流出地数据的研究者要自行设计抽样调查,或使用他人的调查数据。这样的调查范围一般不大,通常做法是先选一个县,再从中选出样本村或村民小组,最后确定调查农户。

流入地调查通常在外来农民工或外来人口有一定比重的大中城市组织实施。“中国居民收入调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等都收集了进城农民工的样本,形成为数不多的多城市、跨年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近年来,覆盖单一或几个城市的流动人口流入地调查项目逐渐增多,其中一些项目的调查对象已经不限于外来农民工,也包括其他外来人口。流入地抽样调查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适用的抽样框(陈传波等,2012)。这背后的原因是,大部分城市没有建立常规的外来人口信息系统。如果城市有外来人口的分布信息,可以通过一定步骤,获得有代表性的样本(侯亚非、洪小良,2007)。在没有抽样框的条件下,在城市农民

<sup>①</sup> 用关键词来代表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粗略的划分方法,可以大致估计研究对象的分布。

工或外来人口调查中,样本集中在中心城、以户籍人口住户信息为抽样基础等,都可能造成系统性偏差。提高流入地调查数据的质量,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地方人口管理模式摆脱户籍制度的束缚,向常住人口管理和城乡一体化转变。

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有时需要使用一些经济、社会、环境统计的“年鉴数据”,主要来源是全国或地方的统计年鉴。研究者使用的来自统计年鉴的汇总数据,主要是地区层面(省份或城市)的一些指标,如GDP、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流动人口研究不能仅仅使用年鉴数据,原因是统计年鉴没有流动人口的统计指标。在研究中,汇总数据一般要与从普查或调查得到的数据联合使用。

为了考察流动人口研究的数据类型分布,我们选取了一批代表性论文。选取步骤如下:(1)在最有可能涉及流动人口研究的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核心期刊中,确定了9种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期刊<sup>①</sup>。(2)利用“中国知网”的信息平台,选择1992~2012年在这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键词为“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人口”其中之一的论文,共选定652篇论文。(3)在上述652篇论文中,再筛选出使用定量数据、具有原创性的代表性论文320篇<sup>②</sup>。

表中给出了代表性论文使用的数据类型与期刊类别的交互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使用流入地调查数据的论文最多,远超过其他的论文数量。这就是说,大多数原创性流动人口研究使用流入地调查数据。使用流出地调查数据的论文数量最少。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流出

表 代表性论文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期刊类别			累计
	人口学	经济学	社会学	
普查数据或1%抽样调查数据	28	1	0	29
普查数据、调查数据合用	4	1	1	6
流入地调查数据	170	15	44	229
流出地调查数据	10	2	4	16
流入、流出地数据合用	8	0	1	9
汇总数据、其他数据合用	23	6	2	31
合计	243	25	52	320

地调查更为困难。使用普查数据或1%抽样调查数据的论文数与使用汇总数据的论文数大致相当,但二者都大大低于使用流入地数据的论文数。表中报告的代表性论文的数据分布,反映了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数据使用的整体状况。另外,从期刊类别上看,人口学期刊使用数据的论文数量最大。但这并不体现数据使用的学科分布。其原因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人口学期刊登载的流动人口研究论文已经走出人口统计的局限,开始步入多学科领域。

### 三、流动人口研究的主要议题

在讨论了主要概念和数据类型之后,可以归纳流动人口研究的模式。以往的研究综述

- ① 人口学类期刊包括《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和《人口学刊》;经济学类期刊包括《经济研究》、《经济动态》和《经济学家》;社会学类期刊包括《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综合类期刊为《中国社会科学》。
- ② 根据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代表性论文的研究主题,我们将《中国社会科学》归入经济学类期刊。

主要侧重研究内容,本文增加了研究设计这一主线,将研究对象、使用的数据类型、研究的性质(描述、解释)等都纳入考量。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从已有文献中,梳理出以下5个主要的研究议题。

### (一) 流动人口的描述性研究

全国流动人口总体描述的研究对象是流动人口,而地区流动人口描述性研究的对象多为这个地区的流入人口,即外来人口。早期的流动人口文献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使用专门设计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0年以后,人口普查数据的开发利用成为流动人口描述性研究的主要手段,这在区域流动人口研究方面更为明显(叶健夫等,2003;李晓、朱宇,2004)。但依然有研究使用地方的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翟振武等,2007)。目前,六普数据已经用于流动人口最新状况的描述性研究(乔晓春、黄衍华,2013;郑真真,2013)。流动人口描述性研究的重点是:(1)流动人口总体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流动时间;(2)流动人口总体的就业特征,如就业岗位与行业、就业方式、收入水平、社会保险参与比例;(3)流动人口的空间特征,如流动人口来源、流向、分布结构、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4)流动因素的描述性分析,如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流出地、流入地的平均收入等。流动人口描述方法比较简明,通常不涉及复杂的统计手段。因此,如果数据质量没有问题,研究结果一般不会有太大差异。流动人口描述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解释性研究提供可参照的基础信息。

### (二) 人口流动因素的中观分析

研究人口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因素属于中观分析,观察与分析单位是地区(省份或城市)流动人口群体。例如,以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为被解释变量的研究(朱传耿等,2002;于涛方,2012),省内和省际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王桂新、潘泽瀚,2013)。这类研究需要利用大样本人口统计数据(普查数据、1%抽样数据等)估计所关注地区的流动人口规模;另一方面,需要收集地区层面的统计年鉴数据,构建解释或控制变量,如人均GDP,人均收入,常住人口规模等。有的研究把流动人口的个体变量纳入,研究流入省份的选择,尝试新的分析模式(周皓,2006)。综观这类文献,各个研究在统计年鉴变量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由于这一原因,尽管“拉力”因素是这类研究的共同关注点,但研究结果的可比性还不够强。

### (三) 农民工外出与回流行为分析

农民工外出与回流行为研究具有鲜明的微观分析性质。在这一领域,一些研究使用了流出地抽样调查数据。这类调查以农户为对象,既包括了外出或回流的农民工,也涉及其他农村劳动者,这样就有了外出或回流农民工的参照群体。农民工外出决策研究一般关注农村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入地特征等因素(时金芝、苏志霞,2004)。在考察收入对外出决策的影响时,有研究尝试对经典的迁移经济学理论进行修正(蔡昉、都阳,2002)。有的学者以农户外出务工时间、务工人数比例等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了户籍改革对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孙文凯等,2011)。农民工回流研究侧重个人、家庭因素和城市就业环境影响

(白南生、何宇鹏,2002;张宗益等,2007)。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使用流入地调查数据来分析农民工外出决策及相关行为。例如,影响农民工外出的内部、外部因素研究(纪韶,2012),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因素分析(刘家强等,2011),农民工家庭迁移行为研究(洪小良,2007)。这些文献为农民工外出与回流行为分析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缺乏抽样框,这类研究多采用非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因此可能存在样本的偏差;流入地调查的另一缺陷是没有外出农民工的农村参照群体。这类问题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因此,这类研究需要获得更多的流出地调查数据。

#### (四) 外来人口相对地位研究

相对于本地人口,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地位?是否受到歧视或排斥?这是流动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早期研究聚焦外来农民工(李强、唐壮,2002;杨彦等,2004)。近年来,外来市民作为一个新变量被纳入观察与研究(张展新等,2007),城市外来人口成为研究对象,形成外来农民工、外来市民和本地人口的“三群体”分析(原新、韩靓,2009;杨菊华,2011;郭菲、张展新,2012)。这些研究以流入地抽样调查为主,也有研究使用了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外来人口地位研究与农民工外出与回流行为研究都是微观个体的分析,但外来人口地位研究关注的不是决策行为,而是就业、收入、保障、居住等方面的不平等状态,即与本地人口的净差异,并试图进行制度性或结构性的理论解释。外来人口相对地位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是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或融合研究,这既有“三群体”比较视角(杨菊华,2010),也有新的关注点(张文宏、雷开春,2008)。在外来人口相对地位研究这一领域,基于流入地调查的研究需要提升样本质量。普查数据或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没有质量问题,但这类数据的原始目的是人口统计,问卷设计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具有理论导向性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研究,这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

#### (五) 外来农民工个体差异分析

外来人口相对地位研究强调群体间不平等,而外来农民工个体差异分析的重点是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这是一个综合的研究议题,包括多个不同的主题。这类研究一般只分析农民工样本,不需要参照群体。这方面的具体议题比较多,例如,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分析(赵延东、王奋宇,2002;姚先国、俞玲,2006),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意愿研究(谢勇、李放,2009),农民工社会网络研究(李树茁等,2007)、农民工进城落户或定居意愿研究(张翼,2011)等。这些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全国性抽样调查、多城市抽样调查和单个城市的外来农民工调查。使用流入地调查数据观察进城农民工群体内部差异,可能存在着样本代表性问题。这类研究的兴趣点差异很大,研究成果也各具特色,但共同点是有助于观察和理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这一研究取向有助于形成新的学术关注点。例如,有研究在分析了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后指出,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已经多元化,但统一的身份类属掩盖了群体分化的事实(符平等,2012)。农民工个体差异研究可以为农民工相对地位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补充。



上述五大议题覆盖了流动人口文献所涉及的大部分领域,代表着不同的研究模式。在流动人口研究中,还有一些分散的主题,没有纳入。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等。这些研究往往有较强的特殊性,不属于以上议题的范围。

#### 四、流动人口研究设计的差异及其挑战

从前面总结的五大议题来看,流动人口文献研究设计的差别很大。各个议题的研究对象不同,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或数据组合不同。从研究的性质来看,除了流动人口描述性研究,其他议题都属于解释性研究,但解释(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的选择各异。人口流动的中观分析与农民工行为分析都力求解释人口流动,但在分析单位和使用数据上有明显区别。城市的外来农民工研究可以重点研究群体间差异,也可以侧重群体内部的差异。研究议题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中国人口流动现象的复杂性:流动人口是多层次、多群体的,因此要区分不同的研究对象;流动动因或约束是多方位的,因此要按照中观或微观、流出地或流入地等多个视角展开研究。另外,研究者的学术训练背景是多样的,包括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这些都是研究设计多样性的原因。

流动人口研究的多样性是学术繁荣的一种表现,但也应该重视与此相关联的一些问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使用的数据、研究目的等差异很大,各类研究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存在着不同研究“各说各话”的现象,相近研究缺乏必要的交流。例如,人口流动的中观研究和农民工外出的微观分析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对话,更谈不到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鉴(主要表现在文献引用上);流动人口相对地位研究与农民工个体差异分析之间也大致如此。第二,有的学者较少考虑不同研究的特点,简单地使用某类研究的标准来评价其他研究。例如,片面强调一些研究的数据代表性问题,忽视其理论意义、地方适用性和学术贡献。第三,有些研究缺乏深度,在不同学科、不同议题的结合部上做一些看似“突破”的文章,实际上真正的学术价值不高。这类研究尽管可以得到发表,但难以置于充分的学术对话之中,不能取得实质性的研究进展。第四,面对错综复杂的研究学科和研究议题,初次进入学术生涯的青年学者难以做自身的学术定位,可能需要经历长期徘徊。应当说,在综合研究领域,大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但是,中国流动人口研究是在不长的时间里,通过多头并进扩展的,因此这类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些情况已经造成研究资源的分割和研究兴趣的分散,影响到流动人口研究的整体发展。

流动人口研究需要积极应对研究设计多样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首先,要加强流动人口的跨学科、跨议题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的探讨,全面认识和理解流动人口研究,把握不同研究设计上的区别与联系。本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尝试。再者,对于研究者而言,在研究中应当加强文献综述工作,尽可能把主要文献和相关文献都收集过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中找出与本研究相关的多个参照点。另外,流动人口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学术研讨会)要增强多学科意识,避免参与者的范围过窄。总之,流动人口研究需要更为宽广的

研究视野、更多互动和学术包容。

## 五、总结与思考

当代中国流动人口文献不仅内容丰富,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性。本文基于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的理念,考察并概括这种多样性,并讨论研究设计差异给流动人口研究带来的挑战。首先对流动人口研究的3个主要概念——流动人口、农民工和外来人口进行了界定和比较;讨论了流动人口研究的数据类型,包括普查数据、调查数据和汇总数据,调查数据又有流出地调查和流入地调查之分;在概念和数据辨析的基础上,概括了流动人口研究的5个经典议题,包括流动人口描述性研究、人口流动因素的中观分析、农民工外出与回流分析、外来人口相对地位研究、农民工个体差异分析;阐述了研究设计的差异、原因及其对流动人口研究发展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本文侧重流动人口文献中的定量研究成果,没有涉及定性的流动人口研究。主要是由于定性研究的特殊性,不便于把这类文献纳入研究设计的比较与综合。实际上,在流动人口文献中,定性研究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颇具特色。在研究设计上,流动人口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差异非常大,带来的交流问题更多。因此,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

把流动人口研究对象归纳为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人口三大类,是以过去积累的文献为基础的。这3个概念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折射出约束流动人口的先赋因素。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整合与社会政策改革的力度很大,户籍身份对流动人口权利地位的不利影响正在弱化。流动人口研究的一些新概念体现了这种变化。例如,“外来白领群体”研究显示,在广州,外来白领的近60%来自农村(李若建,2009)。这一发现构成了对人们所熟悉的“农民工”概念的冲击。职业身份不断强化,就是户籍身份的弱化,就是自致因素作用的不断增长。代表了这种趋势的新概念(如外来白领)及相关研究可能会成为流动人口研究的新议题。

### 参考文献:

1. 白南生、何宇鹏(2002):《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2. 蔡昉、都阳(2002):《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3. 陈传波等(2012):《适应性区群抽样:研究流动农民工的方法与实践》,《统计研究》,第5期。
4. 郭菲、张展新(2012):《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人口研究》,第1期。
5. 符平等(2012):《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6.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3):《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载于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4——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洪小良(2007):《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8. 侯亚非、洪小良(2007):《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报告》,《新视野》,第2期。
9. 纪韶(2012):《“十二五”期间京津冀都市圈农民工流动就业影响因素——微观决策模型分析视角》,《经济学动态》,第8期。

10. 李强、唐壮(2002):《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第6期。
11. 李若建(2009):《广州市外来白领群体现状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12. 李树苗等(2007):《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当代经济科学》,第1期。
13. 李晓、朱宇(2004):《福建省流动人口状况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14. 刘家强等(2011):《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15. 罗茂初等(1986):《全面认识人口流动现象,审慎选择对策——北京市流动人口调查》,《人口研究》,第3期。
16. 乔晓春、黄衍华(2013):《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人口与发展》,第1期。
17. 时金芝、苏志霞(2004):《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本特征》,《人口研究》,第2期。
18. 孙文凯等(2011):《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期。
19. 王桂新、潘泽瀚(2013):《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现代城市研究》,第3期。
20. 谢勇、李放(2009):《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意愿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人口研究》,第3期。
21. 杨菊华(2010):《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水平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22. 杨菊华(2011):《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保障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23. 杨云彦等(2004):《城市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转型》,中国统计出版社。
24. 姚先国、俞玲(2006):《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25. 叶健夫等(2003):《广东流动人口研究》,《南方人口》,第1期。
26. 于涛方(2012):《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7. 原新、韩靓(2009):《多重分割视角下外来人口就业与收入歧视分析》,《人口研究》,第1期。
28. 翟振武等(2007):《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29. 张庆五(1986):《对我国流动人口的初步探讨》,《人口与经济》,第3期。
30. 张文宏、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31. 张翼(2011):《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32. 张展新等(2007):《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33. 张展新等(2011):《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变化:基于不同来源数据的估计》,载于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4. 张宗益等(2007):《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及其决策》,《统计研究》,第12期。
35. 赵延东、王奋宇(2002):《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36. 郑桂珍等(1985):《上海市区流动人口问题初探》,《人口研究》,第3期。
37. 郑真真(2013):《中国流动人口变迁及政策启示》,《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38. 周皓(2006):《资本形式、国家政策与省际人口迁移》,《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39. 朱传耿等(2002):《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人口学刊》,第2期。
40. Fan, C.C. (2001), Migration and Labor-market Returns in Urban China: Results from a Recent Survey in Guangzhou.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3), 479-458.

(责任编辑:朱 犁)